

绪 论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大转折点。自此,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社会面临着大的动荡。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和鬼神观,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形成的。与古代社会不同,这一时期的宗教和鬼神观有自己的特点、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是中国宗教观和无神论发展的新阶段。

一 近代中国的经济与政治

鸦片战争前后,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旺盛时代,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进一步扩大势力、疯狂地进行殖民主义活动的时代,也是它们对中国进行公开的、全面的侵略的开始。不过,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并不始自鸦片战争。早在十六世纪初(明正德年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欧洲殖民主义者就曾叩响中国南大门,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筑碉堡,建据点,进行海盗式的活动,以行贿或武力相威胁强行“通商”。最早来的是葡萄牙、西班牙,接着是荷兰、英国,相继的是法国、奥地利、比利时、普鲁士、丹麦、瑞典、美国等。沙皇俄国也窥伺我国北方。这些西方人,大都不是要同中国进行平等互利通商的商人,也不只是宣扬上帝的传教士,而是口念“福音”、手捧圣经、进行殖民活动的冒险家,是寻找商品市场和原

料产地的殖民者。后来，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逐渐将鸦片作为商品，偷运到中国，以掠夺、毒害中国人民，遭到清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抗，遂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

由于清政府在战争中的动摇、妥协，又脱离人民，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随后，美、法两国不费一弹一兵，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并规定一国在中国所得的利益，其他各国都能“一体均沾”，即一种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这说明，资本主义列强以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其本身及其结果，不是为了互利的通商，而是为了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而这些不平等条约，正是它们强加在中国脖子上的枷锁，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奠定了初步基础。同时，它反映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腐朽，封建统治阶级的软弱无能，以及牺牲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的妥协屈辱态度。老大的封建帝国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寿命不会很长了。

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是贪得无厌的。它们对在中国攫取的这些利益并不满足，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以后又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突出的有：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烧毁圆明园，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以及中俄璦琿条约；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1900年的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签订辛丑条约；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独裁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等等。

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为了反抗外来侵略，反抗封建压迫，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前仆后继，流血牺牲，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不断推向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戊戌维新

变法，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为中国近代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自明代中叶后产生了，成长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虽加速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刺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但并不是使之发展成为独立的、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洋务运动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没有向中国倾销大量商品，以及当时中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而抵制日货，中国民族工业又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发展。

随着社会性质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的对抗阶级。鸦片战争后，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除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还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时的无产阶级还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主要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由于国内外敌人力量的强大，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缺陷及其力量的弱小，它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通过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总之，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从经济上说，中国在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成长为具有一定比例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社会性质上说，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政治上说，由以农民阶级为主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过渡到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思想文化上说，由传统思想文化内部的矛盾、冲突，发展为新学反对旧学的斗争。近代思想家关于宗教和鬼神观的演化，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

二 近代中国有神论思想的种种表现

与古代社会不同，近代中国是古今中外各种神学思想的汇集地。除中国原有的天命论、君权神授说、世俗迷信等传统的有神论继续存在、泛滥，佛教、道教等神学思想的流布外，宣扬上帝的西方宗教神学，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得以生根、发展。它们各显神通，争夺群众，抢占地盘，肆无忌惮。然而，到头来却遭到人民的痛击。

君权神授说的挣扎

天命论、君权神授说是封建神权思想的核心，它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巩固、加强其统治的思想武器，也是近代没落的统治阶级和保守势力的思想武器。

鸦片战争后，封建专制制度腐朽、没落，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统治者除以武力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外，还大力加强思想统治。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一文中，打着“奉天子命”的旗号，以“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的神学思想，号召人们反对太平军，维护清朝封建统治。更有甚者，他还用天命论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所谓“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批候选训导计棠呈豫中采访记略折》）。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张之洞则引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以说明“天秩民彝”（《劝学篇·明纲》）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立国根本，反对维新变法。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了。这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因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成为保皇

派。他为反对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竟然说：“命者，天之所为。人当奉天，只有俟其驱使而已。”（《中庸注》）宣传天命论，反对革命，坚持君主立宪制。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解散国会，提倡“祭天祀孔”，认为“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祭孔告令》，1914年9月26日《政府公报》），宣扬天命论。与此同时，陈焕章、沈曾植、姚文栋等人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出版尊孔刊物，得到康有为、严复的支持，并为之写序，鼓吹尊孔读经，为复辟帝制提供根据。张勋在《上大总统请尊孔教书》中，还提出“无宗教无以一民心”的主张。1916年秋，康有为在给黎元洪、段祺瑞政府上书中，仍坚持“百日维新”时的“定孔教为国教”的理论，要求将其列入宪法，认为“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仪、法度，皆以孔教为本”（《不忍》杂志，第一册）。看来，这时的尊孔与天命论是密切相关的。

世俗迷信横流

与天命论思想并存而不可分的，是跪拜天地、敬神信鬼的世俗迷信活动及其思想的蔓延。诸如：算命、相面、抽签算卦、风水、巫婆神汉、设坛扶乩等，有甚于前。它不仅流行于农村，也风行于城市，甚而波及于知识界。尤为突出的是，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祭天祀孔”天命论思想的抬头，各种迷信组织及其刊物相继出笼，设坛扶乩等迷信活动十分活跃，宣扬神仙鬼怪妖的文章也敢于公诸报刊，大登广告，兴风作浪。

“乩坛”，是一种敬神信鬼、搞迷信活动的组织和场所，我国古已有之。到了近代，特别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大江南北相当流行，后与传入我国的西方“灵学”相结合，打着所谓“科学”的幌子，鼓吹灵魂不灭，宣扬有神论思想。其中，比较突出的神学组织有：1916年的“中国精神学会”，成立于日本神户，

国内设有分部；1917年11月25日，俞复、陆费逵、杨光熙、杨璜等人筹议而于上海开设的“盛德坛”，组成了“上海灵学会”，1918年1月出版了《灵学丛志》；1920年秋，朱翰墀、汪仲良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北京悟善社”，1920年出版了《灵学要志》；1923年，在上海成立的以余萍客为会长的“中国心灵学会”，则开办了“心灵科学书局”，出版了数十种宣传灵学和鬼神迷信的书籍，等等。真是南北呼应，内外相通。

这些“坛”、“会”、“社”、“志”，无所顾忌地公开搞迷信活动，明目张胆地鼓吹迷信思想。“上海灵学会”接二连三地在报纸上登广告，说：“本会同入研究新学，组织灵学会，设有盛德坛，遇有精微不可通之故，辄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明之隔。”（上海《时报》，1918年2月26日）“北京悟善社”的《灵学要志》则公然标明该刊为“神圣仙佛乩笔劝世兴教救劫之书”（《〈灵学要志〉简章》），并说：“悟善社者，神之托于人以劝天下之善，而为民请命者也。”（王树枏：《灵学要志序》）它们大谈道、佛、孔“三祖同乐”，“仙佛圣贤同调”，说什么道、佛、孔、回、耶“五教本同源”，“相合而不相争”。因此提出：“不得排佛攻道，诬为异端，……道乃儒之师，佛即儒之化，若有异词，如自诋其父叔兄长”（《释谛之概论》，《灵学要志》第一卷，第3期）。这说明，他们不仅集古今中外有神论于一身，还将我国古代圣贤神仙化。

其实，他们所谓的“新学”，就是借“坛”、“会”、“社”、“志”所要宣传的“灵学”，如说：“考验鬼神之真理，阐究造化之玄妙。”当这一邪说遭到近代无神论思想家的痛击时，它们又说：“鬼神之说张，国家之命遂促”。（俞复：《答吴稚晖书》，《灵学丛志》第一卷，第1期）“陈先生主无鬼，而我信有鬼”（易乙玄：《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质疑〉》）。

什么是“鬼”呢？他们的说法不一，自相矛盾。有人说：“人

死为鬼，鬼有形有质，虽非人目之所能见，而禽兽则能见之。”

（丁福保：《我理想中之鬼说》，《灵学丛志》第一卷，第1期）有的说，鬼的元素有三种：“生人之余气”、“物质的变体”、“心理的余响”（《灵学要志》第一卷，第3期）。有的说：“其实人与鬼，乃阴阳二气之所生，禀阳气者谓之人，禀阴气者谓之鬼”（同上，第9期）。有的则说，“灵魂之消长，其根据虽不离肉体”，但“以道德的精神为唯一之元素”（同上，第11期），等等。

什么是神仙呢？他们说：“神仙者，人之至善或至圣而成者也。”（同上，第9期）由此，他们利用当时社会的黑暗、混乱，人们缺乏科学知识，以廉价的方式授以登仙成佛为神之法，说神仙佛同人一样，是有“人情”的，只不过是“至情”；人若舍弃父母，离抛妻子，别求神仙佛，自古迄今没有一个人能“得到”的。或者说，人的灵魂一半是先天的，一半是后天的，都“贮于脑”，先天的灵魂为主宰，后天的为附属。人们只要明此理，增强德性，“则灵光日后，根基日固，迨至老死，此种灵光由脑部透泥丸而出，即最完全之灵魂也。视此灵魂之程度等差，或为神，或为佛，或为仙，最下者亦不失为鬼仙”（同上，第11期）。

上述这些荒诞无稽之说，在当时确有很大的欺骗性。它不仅在民间有广泛影响，而且在知识界，极少数人也为其所惑，甚至个别的人还与其为伍。这种种迷信思想及其活动，是辛亥革命失败后至“五四”时期有神论思想中不可忽视的有碍民主和科学的一股势力。

宗教神学思想 麇集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宗教神学思想泛滥。与中国古代不同，无论是东方的宗教神学如道教、佛教、民间宗教，还是西方的宗教神学如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伊斯兰教等，在这一时期的中国，都有影响和流传。其中与政治有关又为

近代思想家所注目的首推基督教，次为佛教。

（一）佛教的“振兴”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作为神学，它的出世思想、灵魂说、果报说、轮回说等继续在社会上流行；在有的地区，信佛、拜菩萨，寺庙林立，香烟缥缈，佛音遍地。作为哲学，它在近代有的思想家有明显的反响，研究、肯定、赞扬之声溢于言表，渗透在一些学术著作的字里行间。一些批驳天命论、世俗迷信的，或是反对基督教神学的思想家，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个别人最后还掉进佛教神学的迷雾中。比如，龚自珍晚年皈依佛教，念经拜佛；魏源晚年潜心佛学，信净土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等人，对佛学颇感兴趣。他们中有的人忽视佛教神学而片面强调其在人生目的、伦理道德上的功用，有的称赞佛教哲理博大深微，有的还把佛教哲学作为自己思想的一个来源。

佛学在近代中国的短暂的振兴，除上述原因，还有以下几条。第一，佛教同其他宗教一样，当人们对现实不满又提不出解决方法，或无勇气去搏斗，对前途陷入困境时，它则乘虚而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存在这样的条件；第二，佛教虽然与西方宗教同为外来宗教，但它早已中国化，适合国人的口味，为国人所能接受，也不为官方禁止；第三，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西方宗教的传入是与帝国主义侵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些进步思想家给予无情的揭露，批驳其“上帝造人”说，斥责其“天国”的虚伪性，而人民则不断地发动反教会的斗争。无疑，这对佛教振兴有着特殊的作用；第四，在有的思想家看来，西方宗教神学的内容，佛教神学早已有之。如此等等，还有其他的原因。

（二）西方宗教神学横行

西方宗教传入中国，主要是指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等。

基督教进入中国也较早。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基督教的

聂斯脱里派经波斯进入中国。当时叫大秦景教，简称景教，为罗马教会的“异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因毁寺杀僧禁佛教，累及景教。元朝初年前后，基督教再次进入中国，当时称为也里可温教，随着元朝覆灭而遭到严重挫折。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耶稣会传教士在广东沿海，谋传教中国，但不得入内地。万历年间（1573—1619）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由广东进入北京，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敲门砖，以讲华语、穿华服、研究汉学、称赞儒术为手段，取悦、结交当时名士，吸收信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是当时皈依天主教的有名之人。利玛窦死后六年，礼部侍郎沈淮向明神宗连上三疏，指出：“裔夷窥伺，潜往两京，则国家之隐忧当杜也。”（《南官署牍·三参远夷疏》）此外有多人著述，指斥天主教祸国殃民，迫使明王朝将外籍传教士驱逐出境，但不久，又有汤若望、毕方济、南怀仁等传教士取得了明王朝的信任，允许在中国自由传教。到清朝康熙时，由于天主教与“尊孔敬祖”矛盾，加之罗马教皇派的钦差铎罗、嘉乐来中国处理教派内部矛盾，“判定尊孔敬祖为异端，不许通融。而是时康熙帝则坚持不许尊孔敬祖即不准在中国传教。罗马与康熙两方面意见不能相容，传教事业遂几乎中断”。^①由于康熙间教案迭起，雍正时才明令禁止传教。

其实，中国官方始终把中国人信奉“夷教”视为非法，说成是“邪教”。这是罗马教皇和西方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利用传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处进行‘殖民事业’时，传教士常常被使用为先驱者，基督教圣经被看做是和炮舰同样有效而相济为用的武器。”^②正因为如此，西方传教士一直在中国沿海不断地进行活动。

①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 89—90 页。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 63 页。

鸦片战争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明文规定了欧美各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自由。传教士欣喜若狂，认为这是一个“转机”，“好像一朝重见天日”。由于法国政府的提出，中法黄埔条约明文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建教堂、医院、学校等；如果中国人“触犯毁坏”教堂、坟地，中国地方官当“照例严拘重惩”。1846年，法国政府又对清政府要挟，强迫道光皇帝对天主教正式公布开禁令。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原则，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得到了这一特权。不久，基督教也随之开禁。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传教活动扩大到中国内地。中俄天津条约规定俄国东正教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中法天津条约规定法国“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中法北京条约则规定：中国人妨碍法国传教士活动的，必须“予以应得处分”；在内地设教堂，“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上述不平等条约，有的就是在各国传教士参与下起草、签订的。“上帝”借助武力来到中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得以传播而起作用，充分说明了西方宗教与资本主义侵略的密切关系。此后，大批传教士蜂涌中国，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侵占土地，建立教堂，宣扬上帝，鼓吹“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新约全书》），死后可进“天国”。这就是他们给中国人带来的“福音”。

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无理规定，在中国内地的一些教堂占有大量土地，有的占良田千余亩，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实际上成为封建庄园，使信教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毒害，在经济上受到残酷的剥削。一些西方传教士往往作为本国的谍报员，所谓“大大有助于我们打开全世界的，首先就是传教士。……如果不是传教士，我们就不会象今天这样认识全世界。整个黑非洲大陆，我们主要靠了传教士才知道的。……事实上几乎整个亚洲都在传教的工作之上，把它内部的秘密暴露出来了”（司弼尔，《福音与新

界》第123页)。他们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参与起草不平等条约,威逼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作为向导,参与抢劫,甚而反对中国革命等。而入教的土豪劣绅,则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犯了法则可逃入教堂,逍遥法外。

帝国主义不仅利用宗教进行政治、经济侵略,还利用宗教进行思想、文化侵略,起到军事侵略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传教士在中国建教堂,宣传神学思想,不利于中国人民思想解放。当然,他们也兴办了一些文化事业,如设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出版书籍等,也出版了一些自然科学书籍,在报刊上也介绍了某些自然科学知识,曾为中国近代有的思想家所引用,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传教士中也不乏正直友善之人。但他们传播的大都不是近代西方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且以不损害所谓万能上帝形象为限,竭力宣扬“惟治神心者可兼治人治物之能”(李提摩太:《教务本末》下)的思想。

当他们觉察到上述措施、手法难于“达到中国归向基督的目的”时,则大谈孔教与基督教“实相通”(李提摩太:《救世教益》第六章)，“孔子基督为友”、“凡孔子之善道，基督教无不乐而扶持之”(安保乐:《孔子基督为友论》第8页)。如果说这里的意思还不清楚,那么李佳白说的“孔子要比西方科学更有助于在中国的基督教”(《中国传教大会记录》第584页)的话,则一语道破了欧美传教士由介绍粗浅的西方自然科学,转而唱着“实相通”、“为友”的实质。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西方宗教神学改造中国文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干得很出色,他说:“普天之下,莫非上帝所造之土,率土之滨,莫非上帝所造之人。”(《介绍〈大同报〉》,《万国公报》,1912年2月)这里将《诗经·小雅·北上》中的“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改,完全成了上帝创造地球、上帝创造人的典型的神创说。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实相通”的意思吧!

为了鼓吹神创说，一些知名的传教士往往对中国的尊孔保皇或帝制复辟颇感兴趣，而对民主革命则采取阻挠或反对的态度。李提摩太曾劝说孙中山放弃革命道路，李佳白则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支持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辛亥革命后，一当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政权，在中国的传教士还表示一致为之祈祷、祝福，有的则骂孙中山为“梦想家”、“恶意的阴谋家”。孔教会成立后，李佳白被聘为高等顾问，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这时，尚贤堂与孔教会打得火热，传教士到孔教会演说“与异教相友爱”，而孔教会的人，以及和尚、道士等则成了尚贤堂的宾客，孔、释、道、耶等诸教演出一台大合唱。由于欧美传教士的活动，我国信教的人越来越多。1922年4月4日至9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不顾中国学界的反对，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了第十一届大会，出席的代表有三十余国的一百四十余人，中国各省区与会者四百余人。

天命论、君权神授说、世俗迷信与宗教神学汇合成一股有神论逆流，但阻止不了民主和科学潮流的发展。民主革命的深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的爆发，三大发现等近代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的传入并逐渐普及，使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思想遭到沉重的打击，近代无神论思潮由兴起而进入高潮。

三 近代思想家的宗教观

如何评判宗教，一直是近代思想家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对待宗教神学的态度，正是一个思想家鬼神观的重要内容。

近代学术界在宗教问题上的争论

由于西方宗教传入中国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密切相关，因而宗教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颇引人注目的问题。特

别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学术思想界发生了一系列的论争。

先说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一方面，除了传教士以及其他宗教神学家宣扬宗教神学，还有某些学者否认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说“人群不可无宗教”（《论中国前途当作何种宗教》，《东方杂志》第二卷，第5期），宗教可以“长存”（《宗教扬榷引论》，《东方杂志》第三卷，第7期）；“不可废”（王国维：《去毒篇》，《东方杂志》第三卷，第10期）。另一方面，无神论者则激烈地“反对宗教”，否认它有任何积极作用，针锋相对。如说：“夫宗教者，束缚人之思想阻碍人之进步，使人信仰，使人服从者也。信仰则迷信生，服从则奴性根”，从而提出“必破宗教之迂说，除愚蒙之习见”（《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大陆》第二期）。

“五四”时期，对宗教持不同观点的人，不仅撰文论争，而且在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的三次宗教问题讲演会上，同台演讲论争。其中，王星拱、李石曾等人反对宗教，梁漱溟、屠存实、周作人等“是对宗教持肯定态度的”（《少年中国》第二卷，第3期。1921年2月15日）。此时，李石岑则采取调和态度，认为宗教与科学都是关于宇宙和人生的最后的解决的探究，“固皆未可偏非”（《论宗教》，《民铎》第二卷，第5号。1921年2月15日）。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社、南京少年中国学会分会等，也都举行了关于宗教问题的讲演会。

此外，在基督教问题上的争论。西方宗教在中国早有组织，多次开会，传教讲神学，以扩大其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次是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学校召开了第十一届大会。与此同时，反宗教的人士也召开了大会，并成立了“非基督教大同盟”组织。由此可见当时关于宗教问题争论的激烈程度。

科学与宗教神学是不相容的。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和教育、科学工作者，分析宗教的产生、流布，指出其神学实质，揭露其

危害性，是近代思想家无神论的又一特点。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以近代自然科学为根据，对“耶稣乃至一切宗教”宣扬的神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驳、猛烈的抨击，不赞成中国如欧美某些国家那样“教会化”，不仅提出政教分立，还主张杜绝宗教神学迷信。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态度，与受近代自然科学教育、影响有关。

在近代无神论思想家看来，宗教与科学有“霄壤”之别，为“绝对的不同物”。科学是以事实为根据，重实验，讲真理，后迪人智，有利于社会进化；宗教以起信为本，重信仰，讲迷信，“设虚伪之词以愚民”、“愚人”、“卑人”、“保守”。因“愚人”，它是人的思想的“桎梏”；因“卑人”，它“保存社会贫富贵贱不平之怪状”，为统治阶级利用。他们进而指出：一切宗教所崇拜的上帝、神、仙、佛，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独秀文存》卷一，第228页），宇宙中根本不存在神秘的大主宰，一切的变化和现象，“都无逃于科学之法则”（《独秀文存》卷三，第57页），为事物本身运动所制约；宗教神学不仅“与现代思想不相容”（左学训：《给慕韩太玄幼椿的信》，《少年中国》第一卷，第7期），违反科学和人道主义，还无裨治化，有碍于研究学问。宗教宣扬天堂地狱、末日裁判，要人修德进善，这“全是自私自利的，也算不得真正道德”（《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73页）。有的人在揭露宗教神学危害性时，甚至将宗教神学说成是“五毒”之一。如说：“世界上有五种最大的毒物——（一）国家主义（二）宗教主义（三）家族主义（四）资本制度（五）污浊思想，——布满在宇宙的里面。社会的不良，人心的顽固，都因为受了这种毒气的缘故。”（爱真：《五毒》，《新青年》新五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由此他们指出：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为增进自然的、社会的知识，“益世觉民”，不应迷信佛教、耶稣教，而要剿灭道教神学（钱玄同：《随感录》，《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对基督教、天主教等神学的批判，一是以近代自然科学为根据，否定上帝和神创说，一是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手法。这两方面都有大量的材料。关于前者，他们从逻辑上揭露宗教神学的自相矛盾，不可信；从科学上揭露宗教神学虚妄不实，说明“上帝非实有”（《醒后之中国》，《醒狮》第一期，1905年）。从而得出：“宗教家抟土之迷信乃不衰而自衰矣。”（《淘汰篇》，《大陆》第一期，1902年）关于后者，主要是揭露西方宗教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过程中的作用。如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各国“政府则利用其殖民”（《论保教适所以仇教》，《外交报》第八十五期，1904年）；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独秀文存》卷二，第419页）等等。

对佛教神学的批判，也很激烈。他们指出：世界上根本“没有佛”，所谓佛就是“心”。如说：“什么叫佛？心就是佛，……我能够有恻隐心，有公德心，有开通民智心，有为民族除害心，有为国牺牲心，我就是一个大佛爷了，我还要人家多拜哩，那里还去拜佛。”（《俗弊六则》，《滇话》第五号，1908年）在他们看来，烧香拜佛、“求福消灾”是没有用的。中国人过去尽管拜佛求菩萨，可“还是人人倒运，国家衰弱”（《恶俗篇·敬菩萨》，《安徽俗话报》，1905年）。至于佛像，是人做成的，“泥塑木雕，无幻觉，无心肝，怎么会灵”；而“释迦佛的家乡也被英国灭了，竟是不闻不问。他连家乡都不能救，又怎能救我们……”（《说滇人迷信鬼神之非》，《滇话》第二号，1908年）由此，有的人甚至提出毁神佛、逐僧道的过激主张。

此外，近代思想家还分析了人们信奉宗教的种种原因。如说：“真正信仰宗教的人是没有的，所以入宗教的缘由，都因一时环境所迫，有不得不入之势。譬如信天主教和耶稣教的人，并不是信了基督的道，是因仗上外国人的势力，没有势的也有势了，有势的更不消说了。”信收缘教的人，“也并不是真能够行好习善；

他的欲望，不过是欲借神灵的力量，保佑自己多福多寿多男罢了”。道教是没有什么人信的。对于佛教，“平常是绝对没有信的，到了贫不能生和病重临死的时候，才舍身入寺，托福神下，免得饥寒交迫煎受那样的苦”。总之，信教的人，“为的求福求寿，免灾免难。至于到无灾无难的时候，自己对于神怪的事疑信参半底（萧澄：《山西底正面一部分的社会状况》，《新青年》第七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应该说，这种分析虽然不够全面、深刻，但还是触及到了若干客观存在的社会实情，有其合理处。

近代著名思想家对宗教的评估

宗教属文化范畴，上层建筑，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既不是与人类同时生的，也不会与人类共存，必然先于人类而消亡。

宗教作为社会中一种团体，是由一定数量的、具有共同教义、信仰的人组成的，有其组织机构，但与国家、党派、社团等是不同的。它有教主、教徒、教理、经典、教规、仪式、机构等，因之也与一般的世俗迷信有所不同，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就其敬神信鬼、宣扬神学这个根本点上说，它又与天命论、君权神授说、世俗迷信等一样，都是有神论，与科学对立，禁锢人的思想，有碍学术进步，不利科学发展。因此，对宗教神学持什么态度，往往是判断历史上一个思想家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的一个重要标准。

敬神信鬼、宣扬神学（即宣扬神、仙、佛、上帝主宰着世界，宇宙中有天堂、人间、地狱三种世界，人行善做好事，死后灵魂不入地狱而升天堂，或入涅槃而成佛，或长生不死而成仙等），是宗教教理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除此，宗教教理还讲人的行为规范的道德问题、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人的命运问题，等等。当然，这些问题与神学问题是不可分的。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昌明，人智大开，宗教的神学部分将受到猛烈的抨击，其影

响日益减弱，其神理日趋淡化，但劝人为善部分似将显露而被抬高。然而，不论其如何改良、演化，宗教终将趋于消亡。

以上这些问题，近代思想家都有所涉及，但他们对宗教的基本观点及其态度各不相同。洪秀全、洪仁玕信奉基督教，反对佛教、道教，尊崇上帝，否认一切“邪神”。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四人在科学领域内，一般都贬低宗教，相信科学，同时又承认宗教有利于人的道德的培养，人群风俗的形成。但细考究起来，这四人有颇多的具体的不同，甚或对立。康、谭、梁三人崇佛教，贬低西方宗教；康氏认为事鬼神上帝乃人类“公理”，谭氏认为慈悲和灵魂是宗教的两个公理；梁氏认为宗教有爱和迷信两种作用；严复抨击西方宗教，认为它奉“空理”为“宗主”，事天神，公开否认神创说，晚年信奉佛教。而梁、严二人还分析了宗教与学术、道德、哲学、国家等的区别及其关系，认为宗教贵信，是强信、妄信、迷信，不可以知“道”，而哲学贵疑，“言心性”，是“求理道之真”，因而哲学不能代替宗教。章炳麟崇佛理，猛烈地抨击基督教，反对神创说。孙中山批佛教，认为科学较宗教为优，强调宗教“富于道德”，有益于民德，肯定政治重于宗教，说宗教是讲将来的事，在世界以外的事，为死后灵魂谋幸福，“近于空虚”；政治则是讲现实的、有切肤之痛的事，为人谋幸福的，有凭有据。陈天华、朱执信、蔡元培、胡适等人既批佛教，又驳敬奉上帝的西方宗教。其中朱、胡二人，认为宗教讲迷信，宣扬鬼神是“精神上的鸦片烟”，与人类天性相反，它排斥肉体，禁遏情欲，反乎人性，不合人道，必须废弃。蔡氏认为凡宗教都有神秘主义思想，是学术进步、思想自由的“障碍”，不承认宗教在科学、教育、政治、道德、美育、哲学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主张用美育、哲学代替宗教，指出今后宗教必被淘汰。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否认一切宗教，反对鬼神仙佛上帝，认为宗教是“有鬼神，重迷信，贵虚伪”的，导入于昏昏，应立即